

钱锺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

杨绛

一九三九年暑假，锺书由昆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，打算过完暑假就回校。可是暑假没过多久，他就接到他父亲来信，说自己年老多病，远客他乡，思念儿子，又不能回沪。当时他父亲的老友廖茂如先生在湖南兰田建立师范学院，要他父亲帮忙，他父亲就在兰田师范任职，并安排锺书到兰田师范当英文系主任，锺书可陪伴父亲，到下一年暑假，父子俩可结伴同回上海。锺书的母亲，弟弟，妹妹，连同叔父，都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。有锺书陪伴他父亲，他们都可以放心；锺书由他父亲的安排，还得了系主任的美差。这不就完善得“四角俱全”了吗？锺书不是不想念父亲。但是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，他正希望不负责校师长的期望，好好干下去。他工作才一年，已经接了下一年的聘书，怎能“跳槽”到兰田去当系主任呢？他又不想当什么系主任。即使锺书这么汲汲“向上爬”，也不敢愚蠢得不知国立清华大学和湖南兰田师院的等差。不论从道义或功利出发，锺书决没有理由舍弃清华而到兰田师院去。锺书没有隐瞒他的为难。可是家里人谁也不理睬，谁也不说一句话，只是全体一致，认为他当然得到兰田去，全体一致保持严肃的沉默。锺书从小到大，从不敢不听父亲的话（尽管学术上提出异议），他确也不忍拂逆老子的心愿。我自己的父亲很“民主”，从不“专政”的政，可是我们做儿女的也从不敢违抗父亲。现代的青年们，恐怕对这点不大理解了。锺书表示为难，已有倔强之嫌；他毕竟不敢违抗父命。他父亲为师院聘请的人，已陆续来找锺书。他父亲已安排停当；找这人那人，办这事那事。锺书在家人的压力下，不能不合作。可是就此舍弃清华，我们俩都觉得很



杨绛与钱锺书

不愿意。

我们原先准备同过一个愉快的暑假，没想到半个暑假只在抗衡不安中过去。拖延到九月中旬，锺书只好写信给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，说他因老父多病，需他陪侍，这学年不能到校上课了。（参看《吴宓日记》，第七七七十四页“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八时三十分回舍，接〔叶公超〕片约，即至其宅，悉因钱锺书辞职别就，并谈商系中他事。”）锺书没有给梅校长写信辞职，因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亲回上海后重返清华。

叶公超先生没有任何答复。我们等着等着，不得回音，料想清华的工作已辞掉。十月十日或十一日，锺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，和兰田师院聘请的其他同事结伴离开上海，同往湖南兰田。他刚走一两天，我就收到沈茀斋先生（梅校长的秘书长，也是我的堂姐

夫）来电，好像是责问的口气，怪锺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。我莫名其妙。梅校长并没来什么电报呀！我赶紧给茀斋哥回了电报，说没接到梅校长的电报，锺书刚走。同时我立即写信告诉锺书梅校长发来电报，并附去茀斋哥的电报。信寄往兰田师院。

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发表钱锺书致梅贻琦和沈履（即沈茀斋）信，我没见到过锺书这两封信，值得重抄。钱锺书致沈履信如下：

茀斋哥道察：十月中旬去沪入湘，道路阻艰，行李繁重，万苦千辛，非言可尽，行卅四日方抵师院，皮骨仅存，心神交瘁，因之卧病，遂搁音书。十四日得季康书，公有电相云云，虽赴湘亦复失梅电云云，不胜惊悚。不才此次之去湘，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。此中隐情，不堪为外人道。老父多病，思子欲病，遂百计强不才来，以便明夏同归。其实情如此，否则虽茂如相邀，未必应。当时便思上函梅公，而怯于启齿。至梅公赐电，实未收到，否则断无不复之理。由湘局一查可知也。千差万错，增我之罪。静焉思之，渐愧交集。急作书向梅公道罪。亦烦吾兄婉为说辞也……昆明状态想依然。此地生活尚好，只是冗长。不知明年可还我自由否。匆匆不尽。书已专函寄梅公矣。即颂
近安

小弟 钟书顿首
十二月五日

钱锺书致梅贻琦信如下：

月涵校长我师道察：七月中旬匆匆返沪，不及告辞。疏简之罪，知无可逭。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，待教有日，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。岂料人事推排，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。九月杪屡欲上书，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，吾师及芝

生师栽植之恩，背汗面热，羞于启齿。不图大度包容，仍以电致。此电寒家未收到，今日得妇书，附茀斋先生电，方知斯事。六张五角，弥增罪戾，转益悚惶。生此来有难言之隐，老父多病，远游不能归，思子之心形于楮墨。遂毅然入湘，以便明年侍奉返沪。否则熊鱼取舍，有识共知，断无去湘之理。尚望原心谅迹是幸。书不尽意。专肃即叩
钧安

门人 钟书顿首上
十二月五日

致沈履信所说“十四日得季康书”，当是十一月十四日，钱锺书到达兰田师院的日子，因为他路上走了三十四天。给梅校长信上的“今日”，当是泛说“现在”。他跋涉一个多月到达兰田，方知梅校长连着给了他两个电报。他不该单给叶先生写信而没给梅校长写信，这是他的疏失。梅校长来电促他回校，实在是没想到的“大度宽容”。不知前一个电报是由谁发的、什么时候发的。我们确实没有收到。不知校方是否查究过这个电报的下落。第二个电报偏又迟到了一两天。如果锺书及时收到任何一个电报，他是已经接了聘约的，清华没解聘，他就不能擅离本职另就他职。他有充分理由上禀父亲。他可以设法去看望父亲而不必离开清华。命运就是这么别扭。工作才开始，就忙不迭地跳出去“高升”了，不成了一个“为德不卒”“有始无终”的“小人”！锺书所谓“难言之隐”不堪为外人道的“隐情”，说白了，只是“迫于严命”，而锺书始终没肯这么说。做儿子的，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，而且他自己也确是“毅然入湘”。锺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离开了西南联大。

（选自《杂忆与杂写（增订本）》三联书店 2010年七月版）

海，你快去看看，你爸爸到哪儿去了。”我跑出门一看，只见很多人扛着梭镖拿着刀，向姓吴的地主家围去。华高走在前面，很快就把姓吴的地主的房子包围起来了。有人爬墙进到院子里，打开了大门，外面的人端着梭镖，举着大刀，一拥而进。不一会儿，把姓吴的地主拖了出来，拉上了后山。接着又把底铺子的恶霸华早、华能等四个坏家伙也拉来杀了。人们都在议论纷纷，说：“好，革命了，明天就宣布成立苏维埃。”我到处找父亲，可是哪儿也找不着，于是就大声叫喊。华高跑到我跟前说：“你爸爸一会儿就来了，走，我们到祠堂去吧。”祠堂里已挤了好多人。到三更天时，父亲和来合云、朱文焕从大吴家回来了。来合云说：“明天成立苏

府、土地委员会、妇女委员会、儿童团、少年先锋队等红色组织；红枪会改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二团。华高当了团长，父亲是党代表。不久第二团就出发到东区去打地主的寨子，我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了。

这是我过红军生活的第一课。我年纪小，个子矮，生怕人家不要，处处尽量装着个大人样。父亲在前面走，我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，跟在后边。一路上，我模仿着父亲那样一大步一大步地走。走着走着就被落下了，只好踢踢踏踏地跑一阵撵上去。父亲听到这踢踏的声音，就习惯地回头看看我，我也装着没事一样看看他。开始还可以，以后越走越吃力，父亲终于开口说：“你快给我回去吧，跟着一路

民团还在睡大觉，打了几枪，他们就吓跑了。团部就留在这里。部队都上山围寨子去了。华官和文谋叔叔忙着杀猪做饭，我帮忙烧水。到柴堆上去拉柴火时，一拉，发现了一根皮带。这是什么皮带呢？顺手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支汉阳造步枪。我真高兴极啦。中午，华官、文谋给部队送饭时，将这个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即刻派人下山来把枪要去看，我也跟去了。到了那里，华高团长看了枪，笑着对我父亲说：“好，我们团又多一支钢枪了。”父亲要我回团部去，把枪留下，我说什么也不肯。他说我不服从命令，要揍我，我才吓走了。

一九二九年春天，部队到油炸河以北的小村庄驻下，防止大山寨的地主民团扰乱根据地。这时部队已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九支

我跟父亲当红军

吴华夺

奔西跑，开会叽咕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忙的什么。

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晚，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（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）。母亲连忙端上饭来，父亲把饭推到一边，戴上帽子，又向外走去。母亲和我都很奇怪，也不敢问出了什么事，坐在家里等着。一直待到快二更天，也没见父亲回来，妈说：“小

维埃。”我连忙跟着问：“什么是苏维埃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共产党？”来合云说：“苏维埃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。好小子，你想当共产党吗？老子是共产党，儿子大概不成问题吧！”说着一把把我抱起来：“小家伙不简单，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？”我说：“共产党是打地主的。”来合云笑了。

第二天成立了乡工农民主政

府，上级又发来两支枪，是给团长和党代表的。有一次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偷偷地拿着枪玩弄，不知道有顶膛火，一拨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老百姓的一条老黄牛打死了。我吓得要死，急急忙忙去找团部司务长。司务长是个老人，平时最喜欢我们这一帮小鬼，他看我吓得那样，又好笑又生气地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小鬼呀，光给我找麻烦，你知道，赔老百姓一头牛要十四块光洋。”说着就找老乡去了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父亲回来了，一听此事，可发了大火，顺手甩了我两个耳光，又把我关起来，不给饭吃，非要我回家不行。虽然脸上火辣辣的，但我却哭不哭。我知道父亲是个刚强人，从来不喜欢看哭鼻抹泪的人。不过我心里暗自思量：这一下糟透了，如果真派人把我送回去怎么办呢？正想着，华高团长来了，他训了我几句，叫我以后千万听话，就把我放了出来。这下我可高兴啦，急忙又去烧水。谁知一锅水没烧开，父亲又来找我了。他气呼呼地说：“三番五次地说你年岁太

小，不够垫脚板的。”我鼓鼓嘴，就是不回去。他沉下脸，说：“你非给我回去不行！”我一看拗不过他，就离开队伍嘟嘟囔囔地往回走。走不多远，趁他不注意，又钻到队伍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，毫不客气地又把我赶出来，而且还在一旁监视着我。我生气了，没办法，蹲在路旁，眼看一村的人都神气活现地走过去，真急死人。忽然有人叫父亲到前面去，我又趁空钻进了队伍。

这时大雪飘飘，风也吹得挺

紧，人们都耸着肩，缩着头。约摸快到中午，父亲到后边来检查行军情况，又发现了我。他还是赶我回家。我说冻死在外面也不回去。他看没法，就从身上脱了件单衣给我包头。我嘴里说不冷，其实两只耳朵和脸上像刀子割，怎么也止不住上下牙打架。本家吴华官大哥对父亲说：“你到前面去吧，我来招呼他。”父亲瞅了我两眼，就到前面去了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，部队

到达八里区南村，准备对龙盘寨、李山寨进行包围。部队到李山寨正西六里的李家楼时，天刚拂晓，



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（左）、政委任弼时（右）、副政委关向应（中）

悄吟和三郎（注：萧红和萧军）来到上海，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，手中仅有的几个钱很快便用完了。写出的文稿无处发，寄给鲁迅先生的稿子，什么时候发出来也在不可知之数。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坐吃山空，他们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。怎么办呢？办法只有两个：一个是想求鲁迅先生给介绍个工作，这是长久的安身之计；另一个是向鲁迅先生求借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关于介绍工作，鲁迅先生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工作难找，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。”关于借钱，鲁迅先生也回答得很干脆：“我可以预备着的，不成问题。”鲁迅先生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想着要当面考察一下这对年轻人。于是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鲁迅先生给萧军、悄吟写了如下这封信：

刘先生：
吟先生：
本月三十日（星期五）午后两点钟，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？小说如已抄好，也就带来，我当在那里等候。那书店，坐第一路电车可到。就是坐到终点（靶子场）下车。往回走。三四十步就到了。
此布，即请
俪安。
迅上十一月二十七日

接到这封信，像在青岛接到鲁迅先生的第一封信时一样，又激起了这两位年轻作家火一样的热情。他们就像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又将一下子见到母亲一样，他们想象着母亲现在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。他们把两个脑袋紧紧地贴在一起，共同在想象中描绘着鲁迅先生的容貌、仪表、风度。悄吟孩子般地问：“三郎，你说鲁迅先生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？”萧军像早就认识鲁迅先生似的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高个儿！那还用说，顶天立地大丈夫吗！”大概悄吟对萧军的话是确信无疑的，她没半点儿不相信或想争议的意思，便又孩子般地问：“你说先生是胖子还是瘦子？”这回萧军边想边说：“胖是不会太胖，因为先生说过，他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！”悄吟猛捶了两下萧军的脊背说：“你可真会为自己的观点找论据！”两个人就这样兴致勃勃地猜测一气，又把信展开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着。读完，萧军抚摸着悄吟的留海儿，像慈父般地说：“小孩子，就像傻高兴，还不知道靶子场在哪儿呢！”说着便去他们一到上海便买来的市区交通图，悄吟却说：“看那没用，先生告诉得明明白白的，坐一路电车，坐到终点就是靶子场，再往回走三四十步，见到书店就是了！”萧军一听，觉得真是那么回事。便破颜一笑说：“人的聪明说不上在那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！”悄吟有些骄矜地说：“如果这个人真正是个聪明的人，那么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表现出来！”萧军又服输似地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你是真正聪明的人，你是真正聪明的人！”

二人不再逗嘴，又读起那封信来。
十一月三十日，是上海难得的一个冬日的晴天。虽然风里仍含着水雾似的湿气，但是晴空的太阳却给这冬日带来了异样的温暖。悄吟和萧军要见他们久仰的一位伟人了，换换衣裳吗？按常理是应该换换的。因为衣裳可以表明一个人的身份，给人留下印象就更真实。”悄吟也实在无计可施，只好像萧军所说的那样。于是他们仍穿着从青岛来的那身“粗野得可以”的装束，到下午两点，准时来到了鲁迅先生指定的见面地点。

几天来，他们就共同想象着鲁迅先生的形象，悄吟完全相信萧军所说的是完全准确的：先生一定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形象。可是一见面，两人都惊讶不已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，面目清癯，唇上留有厚厚的一绺黑胡子的老人。若把他身上新着的黑长袍换成短袄，和他此刻脚上穿着的青帆布胶鞋一配，简直是个道地的乡下老头！但这两位从伪满洲国来的年轻人又细细打量了一番之后，觉得他们刚才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：先生两眼的神采是逼人的，看他所有一切都是这高大形象挤得无影无踪……

从此，作为虔诚的弟子，萧红和萧军神奇地闯入了鲁迅先生的生活中。

（选自《只有香如故》哈尔滨出版社出版）

人，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。因此，使这两位年轻人又敬畏地出了一口气。先生手里拿着一顶旧毡帽，腋下挟着一个黑绸子印花的布包袱。见面之后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鲁迅先生便把这两位年轻人领出了内山书店，来到了一家小吃茶店。这家小吃茶店设在老靶子路，只有门面一间，在门面里面有客座，座位不多，时常很安静，加上光线也不充足，显得有些冷清。这是鲁迅先生约会客人的固定地点。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，是这里的老板是犹太人（或许是白俄人），对中国话听不太懂的。他们坐定之后，鲁迅先生先关心地询问他们来上海住得习惯不习惯，没等悄吟说，萧军便抢先说：“就是觉得冷一些。北方的冬天虽然比这里要冷多了，但屋里暖，有炕，有炉子，城里有暖气。上海不同，外边怎么冷，屋里就怎么冷，所以有时觉得比北方冷。”鲁迅先生深深吸一口烟说：“北方靠外界给身体取暖，南方不一样，得靠自己身体给自己取暖！”萧军和悄吟都感到奇怪，不知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初次见面，又不能唐突贸然去问，只得等待先生回答。先生一眼看出了两人的疑惑，便朗朗地笑着说：“吃辣椒！吃辣椒有时会辣得额头冒汗，全身自然跟着也就暖了！”悄吟和萧军先笑起来，鲁迅先生又跟着笑起来。正笑着，许广平先生携海婴进来了。鲁迅先生把许广平和海婴介绍给萧军和悄吟。悄吟第一眼看见许广平那高高的个子，便一下子想起了那死去多年的母亲。是许先生高高的个子还是她的模样？不知怎么悄吟觉得许先生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。她仔细打量着，觉得越打量越像，于是低下了头。海婴这孩子也许是这吃茶店的常客，全不把客人放在眼里，围着桌子转起来没完，并不时地和爸爸、妈妈说话。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，萧军和悄吟一句也听不懂。

悄吟和萧军同鲁迅先生的一家，就这样相识了。悄吟给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留下的印象：道地的满洲姑娘，她那小时候特别睡出的平平的后脑勺，突出了满洲姑娘的特征。另外，使他们难以忘记的，就是悄吟那苍白的脸色，还有那过早出现的花白的头发。由此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：悄吟是一位经历非凡的女性。

初次见面，双方都觉得无更多的話好说，遵前信之意，鲁迅先生递给他二十元钱，萧军和悄吟当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因为他们切身的经历是：在哈尔滨时常常求借，但朋友的十元钞票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欢乐，就仅仅那么一次！常常是借到一元钱的时候都很少很少啊！多数是几角钱几角钱地借……而鲁迅先生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就慷慨解囊，为他们拿出二十元钱，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。鲁迅先生那瘦小的身躯，在他们的面前立即变得高大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大，顿时顶天立地，遮住了他们的视线，使他们此刻的眼中只有鲁迅先生的形象，其他所有一切都是这高大形象挤得无影无踪……

从此，作为虔诚的弟子，萧红和萧军神奇地闯入了鲁迅先生的生活中。

中负了伤。到罗山休养的时候，听说父亲随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了。一九三六年，我随红军长征到宁夏马池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就到处打听父亲的去向。后来见到了熊起松、吴华江两同志，他们才告诉我，父亲在豫西牺牲了。

我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，就偷偷地跑到村外，坐在一棵大树下哭起来。突然觉得有人站在我旁边，回头一看，是党的总支书记。我揉了揉眼要站起来，却把我按住，坐在我身旁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，劝慰我一番，然后告诉我：“不要哭了，我们手中有枪，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！”他拉着我的手站起来说：“回去吧，同志们都在等着你。”黑暗里，我跟着这位对我关怀体贴备至的领导同志走回部队。我又感到了慈父般的温暖，这是巨大的党的温暖！父亲倒下了，党把我抚养大成人了。

几天以后，我又和大家一起背起行装，踏上了征途，沿着我的父亲没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！

（选自《星火燎原全集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）